

中国农民

流动就业与现代化

● 崔传义 著

全书的核心关怀是

→ 农民、农民工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
与我国现代化发展
→ 及国家政策和治理的关系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全书的核心关怀是

农民、农民工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
与我国现代化发展
及国家政策和治理的关系

中国农民 流动就业与现代化

● 崔传义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流动就业与现代化 / 崔传义著.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577-0292-2

I. ①中… II. ①崔… III. ①农民-劳动就业-研究-中国
IV. ①F3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9412 号

中国农民流动就业与现代化

ZHONGGUO NONGMIN LIUDONG JIUYEYU XIANDAHUA

著 者: 崔传义

责任编辑: 李慧平

装帧设计: 奥 华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133(发行中心)

0351-4922085(综合办)

E — mail: scb@sxjjcb.com 市场部

zbs@sxjjcb.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jj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47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77-0292-2

定 价: 80.00 元

序言一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城乡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城乡之间人口分布的变化更是令人惊叹。1978 年，我国的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17.9%；而 2016 年，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 57.35%。38 年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提高了近 39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 1 个百分点以上。如此持续、快速、大规模的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固然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拉动的结果，但其间更是充满着广大农民群众为追求自身幸福生活而奋力打拼的艰辛。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不仅严格限制着农业人口进入城镇，也严格限制着农民在农村自主发展非农产业。这使得农村在人增地减的背景下，农民难以充分就业、难以摆脱贫困。农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后，不仅充分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更赋予了农民家庭支配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自主权。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先是有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接着又有了气势磅礴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大潮。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得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民有了就地就近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机会，最兴旺时，全国农村有 2000 多万家乡镇企业，吸纳了 1.2 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当时被誉为占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城镇中出现了大量合资、外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少国有企业也通过改革重新焕发了生机。乡镇企业的竞争对手多了、强了，而工业企业的布局也合乎逻辑地开始向城镇、向各种开发区、工业园区集聚，分散在乡村中兴办的多数乡镇企业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优势，不得不进行改制、转型，农民离土不离乡就近到乡镇企业的转移就业模式明显陷入了困境。但农民绝不甘心重新回到自家承包的那小块土地上去苦熬，于是，顺应城镇正在兴起的工业化大潮，他们勇敢地背井离乡，去追逐工业化、城镇化浪潮所带来的各种新的就业机会。农民大规模的跨地域流动就业，不仅满足了城镇兴起的工业

化浪潮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更是有力地冲击着已形成多年的城乡割裂的劳动力就业二元体制，由此推动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着更深层次拓展。可以说，我们经历过的那个阶段，正是我国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发生历史性转变的重要阶段，也是农村积蓄太久、太多的富余劳动力寻求转移就业机会的重要阶段。这两者不谋而合，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的不谋而合，我国也不可能快速地成长为居于世界前列的制造业大国、国际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大国。在我国这一阶段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亿万流动就业的农民劳动力功不可没。而对于那些远离当时经济增长极的中西部地区农村，也正是有了农民劳动力可以跨区域流动就业的机会，才为那里的农民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使他们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从而燃起了他们心中追求幸福生活的希望之火。

然而，农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就业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尚未彻底打破的城乡二元割裂的体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策体系、思想观念和社会氛围，使得农民劳动力的流动就业过程充满着艰辛。但这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从传统迈向现代进程中所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这个进程尚远未完成。而正是因为这个过程具有必然性，因而必须努力改革那些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就业的体制性障碍，加快完善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就业的政策体系，创造条件，以减少流动就业的农民劳动力所可能遭遇的磨难，并使有意愿、有能力落户城镇的农业人口能够顺利地转为市民。

但同时也要看到，一方面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现象；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受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正在不断加深，而全球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又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建立起通畅、低成本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和农业人口转化为市民的体制机制及政策体系，必然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短时期内就能实现使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都到城镇就业、农业人口都转变为市民的目标。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便将来人口的城镇化率能达到 70%、80%，但仍在农村生产、生活的人口仍将有三四亿之巨，因此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才能实现城乡之间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继续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在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基本社会保障以及在就业机会等方面，也能

够享有与市民平等的权利。

我国人口总量大、农业人口比重高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与那些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必定是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这其中也包括城乡之间人口分布格局的自身特点。毕竟，当前所有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也不及我国的总人口多；毕竟，美国的总人口还不及我国总人口的零头、日本的总人口还不及我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十几亿人口在现代化进程中将形成怎样的城乡分布格局，这其间的规律只能靠我国通过自身的实践去探索，而没有什么完全适用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照抄。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真正使农民变为市民并不断提高素质，需要长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和农村流动，是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历史时期都会存在的现象。对这种‘两栖人’、候鸟现象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恶意炒作。对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但就业不稳定、难以适应城镇要求或不愿意落户城镇的人口，要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努力解决好他们子女上学、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需求，使他们在经济周期扩张、城镇对简单劳动力需求扩大时可以在城镇就业，而在经济周期收缩、城镇对劳动力需求减少时可以回流农村”。“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世界各国解决这个问题都用了相当长时间。但不论他们在农村还是在城市，该提供的公共服务都要切实提供，该保障的权益都要切实保障”^①。

正是基于对国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性的这种重要判断，中共十九大所绘制的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宏伟蓝图中，才明确提出在继续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同时，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不排斥城镇化的进程。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看到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土幅员辽阔、农村人口总量很大的国度里，城乡之间的发展必然是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施乡

^①《习近平 2013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 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594—595 页。

乡村振兴战略这两方面同时发力，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所以，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深化改革户籍制度，让有意愿、有条件进城落户的农业人口顺利落户，并在城镇普遍实行居住证制度，使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享有与当地市民同等权利和义务，同时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均等化，就必然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偏废的两位一体的任务。

本书作者崔传义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的资深研究员，我在1981年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同事去安徽省滁县地区（现滁州市）调研包干到户后农村改革发展情况时就与之相识，并在此后一直得到其热情的帮助。后来传义同志先后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皆与其为同事。

传义同志来京工作后仍一直从事“三农”问题研究。这本《中国农民流动就业与现代化》，收入了他1993—2006年间研究有关农民流动就业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着连续性、多角度观察思考的特点。他坚持以国家现代化应当是多数人的现代化为出发点和理念，结合调查研究、分析历史资料、运用基础理论和国际经验，以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流动就业现象为主，认真分析了这一大规模社会现象发生发展的国情背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原因、对推动改革发展所带来的广泛而深刻影响等，从中展开了他关于农民追求充分就业和富裕对于实现农业国的工业化、推进城镇化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深入思考，得出他关于农民流动就业对于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促进农民工权益保障和农业人口市民化对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国家现代化重大意义的认识。

该书的大部分文章，是在农民跨区域流动就业的必然性和作用尚未被多数人所认可因而遇到诸多障碍的背景下所做出的观察和分析，其中的有些意见和建议在当时起到了为决策提供咨询的作用，其资料价值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尤为可贵。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就业，将贯穿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全过程，“农民工”这个五味杂陈的特殊称谓，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境遇，也将成为衡量我国改革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程度的一大

重要指标。

衷心祝贺崔传义同志该著作的出版，也希望该著作能够成为从事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和农民工问题的理论、政策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有价值参考，从而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陈锡文

2018 年元旦

（陈锡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著名农村问题专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序言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为农民工市民化不懈努力

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促进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已为发达国家不论大国或小国走上现代化的历史所证实。中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农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东方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工业的发展十分滞后，城市化水平很低，农村人口与农业劳动力占总数 80% 以上，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农民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极为贫困。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经过 28 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党领导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推进工业化中，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农民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原始积累。但由于实行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农民成为滞留在农村的“世袭农民”，形成城乡壁垒森严的二元经济结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严重失衡，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农村为突破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农民冒着风险以极大的勇气，突破户籍制度的禁锢，在就地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同时，经过千辛万苦，背井离乡，走进城市，成为“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也就是举世无双“两栖农民”群体，为工业化和城市的发展，提高城市化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最为人们关注的重大事件。

崔传义同志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以后，就去农村土地包干到户改革发源地安徽省滁县地区工作，做了不少调查，特别是从 1993 年起，到全国许多地区调查农民流动问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先后著有《中国农民流动观察》《农民进城就业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中国农民工返乡创新创业创新调研》，合著《走出二元结构，农民就业与创业研究》等，总结了农



民流动进城的发展过程与创造的经验，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有些调查报告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最近新著《中国农民流动就业与现代化》拟出版，对农民工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提出突破二元结构，使农民工真正实现与城市居民均等化对策，具有理论与实际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政府与市场结合的特点，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农村是当时改革的突破口，习近平同志提出将隆重举行纪念活动，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新战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建设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40 年来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农民具有高度的智慧与创新能力，只要有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就能充分释放出这种创新能力，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推开一个又一个绊脚石，产生出巨大的生产力能量。土地的包干到户，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民主政治建设的村民自治，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以及返乡第二次创业等，都是这种创新精神的体现，还涌现出一批像吴仁宝、鲁冠球等著名的农民企业家。目前，全国农民工达 2.7 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接近美国的人口总数，成为城市建设与服务业的主力军，然而仍处于弱势态势。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总结农村改革中创造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排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与体制障碍，切实维护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应有的财产权，促进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实现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展示新的盛世。

郭书田

2017 年 11 月 27 日

（郭书田，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自 1949 年参加工作后，一直没有离开“三农”战线。为农民说话办事，积极开展重大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为农业农村事业建言献策，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和农业部领导批示。2009 年被农业部表彰为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三农”模范人物。）

序言三

在当今农村研究界，崔传义先生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学者。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他研究积累深厚，研究成果别具特色。透过他四十年的研究活动，可以看到一种令人崇敬的精神和态度。

—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崔传义先生具有独特而难得的丰富经历，这成为他研究生涯的超常底蕴。作为“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两届大学生，他于1970年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分配到安徽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在务农一年后，到滁县地区报社工作，后于1977年秋天进入滁县地委调查研究室。

进入滁县地委，是崔传义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很多人知道，万里于1977年7月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安徽启动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主持制定了放宽农村政策的“省委六条”。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省委六条的基本背景是，万里看到滁县地委经过两个多月农村经济政策调查后所写的工作报告，受到启发，认为这是个好的开端，并听取省农委周曰礼对全省农业农村情况的汇报，亲自下农村和推动全省进行3个月的农村调查、上下商讨，在此基础上主持制定了“省委六条”。当时的滁县地委政策研究室，既有注重实际、联系群众、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又有崔传义等经过大学教育肯学肯干的年轻人。这个研究室，是地委书记王郁昭推进改革所倚重的核心智囊。

滁县地区成为安徽农村改革策源地，成为小岗村大包干诞生地，这并非偶然。1983年1月，万里代表中央与安徽新班子谈话，谈到中央决定任命王郁昭担任省长，称赞“王郁昭同志在农村改革中带了个头”。这种带头作用，不仅表现在万里主政安徽时，滁县地区率先放宽农村政策，扩大农民自主权，更表现在万里离开安徽后，新省委第一书记尖锐指责家庭承包，众多地县纷纷退却，滁县成为改革孤岛。在王郁昭处境困难、力撑危局的时候，地委政

研室的骨干包括崔传义等是不可多得的助手。在滁县地委工作5年间，崔传义亲历了这一阶段农村改革的全过程，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参与了地委一些重要政策文件起草。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一起编辑《万里文选》时，因为早期资料收集困难，万里一些重要讲话片段，是根据崔传义当年的记录整理而成的。

1982年秋天，王郁昭调省委，崔传义也随同离开滁县。在省里工作5年间，他作为王郁昭秘书，既要处理日常行政，但更侧重调查研究。此间，根据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势演进，他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聚焦于完善家庭承包、发展乡镇企业、农村专业市场、小城镇建设等问题。他不仅参与众多文件和讲话起草，而且多有独立研究成果形成。

1987年秋天，王郁昭调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崔传义随同进京。3年后，由于机构变动，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在北京30年间，崔传义一直从事农村问题研究。他依托深厚的地方工作积淀，着眼全国性问题，视野更加开阔，研究专题也更加集中。这30年，集中精力于农村问题两大领域，即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民就业问题。特别是在农民流动就业领域，积30年之功，成果丰厚坚实。

在本书之前，崔传义已出版研究专著四部。2009年，崔传义出版《中国农村经营变革调查》上下两卷，90万字。收入该书的，是1978—2008年间70余篇文章，一部分篇章完成于安徽滁县，是参加农业大包干全过程的记录。这些报告是农村改革发轫时期的宝贵资料。从农村改革30年进程而言，贯穿该书的基本脉络是，“农业大包干、农户经营—市场、企业、城镇—中间组织、合作、服务—发展与政府”。或者说，该书记述从农民创造大包干的家庭承包制到农村经济转向市场体制、中间组织发育、政府支持与保护的历程。

崔传义还陆续出版了《中国农民流动观察》《农民进城就业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调研》等专著。包括本书之内，崔传义已经出版关于农民就业问题的专著四部。这些著作体现了崔传义农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二

农民就业成为政策议题，是伴随家庭承包之后。这个问题最初受到高层

关注,用当时的政策语言来表达,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这个时候说的“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在农村内部向非农领域转移,而不是后来所谓的“跨区域流动”。民工潮爆发之后,规模急剧扩大,流动成为常态,相应社会、经济问题不断突显。30多年间,农村就业和流动问题,在政策研究和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不断拓展提升,构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核心话题。崔传义的研究贡献,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领域。

崔传义属于最早进入农民流动研究领域的那批学者,是这个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先锋和开拓者。更重要的是,作为专业政策研究人员,他也是这个领域工作时间最持久者。从8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现在,30余年间,他一直专注于农民就业领域的相关专题调查研究。以本人视野所及,环顾改革以来农民流动研究,崔传义属于资历最深的专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崔传义进入北京不久,就在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农村劳动力课题组成员的接触中,敏锐地发现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性。1989年春,民工潮爆发,高层愕然,崔传义立即投入实地调查。就在当年夏天,崔传义参与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创办。自此以后,崔传义一直工作在这个领域,他牵头和参与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农民工问题调查,完成了若干有重要政策影响力的研究报告。不论是相关部委的政策研究,还是国务院文件的讨论起草,崔传义成为几乎不可或缺的咨询专家。现在,他已经73岁,依然工作在研究一线,或奔波于村野,或操劳于键盘。在农民就业领域,他的调查研究相当广泛,从家庭承包后出现劳动力剩余,到初期的农民流动,再到农民在流动中遭遇政策和体制羁绊,再到农民流动后的返乡创业,等等。所有这些重要的研究专题,他都有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

崔传义关于农民流动就业的研究成果,如果包括本书在内,迄今有四部专著。《中国农民流动观察》出版于2004年,汇集了1993—2003年间的调查报告。民工潮初期,在相当时间内,既受到一些社会舆论指责,更遭受制度性限制。那些年,虽然全国性市场化改革在推进,但对农民流动的歧视性限制依然在持续。直到2003年,这种制度限制才取消。那些年,崔传义深入城市企业和农民工社区,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形成报告,提出建议。此间十余年,他先后组织了不同地区28个县(市)调查,苏南、珠三角、温州等地调查,进京农民工及其子女就业、就学、居住和收容遣送的调查。连续10

年的调查，记录了农民流动的进程，展现了问题的演变，并参与起草 2003 年国务院办公厅 1 号文件——《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这是一个取消对农民流动歧视性限制的历史性文件。

《农民进城就业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出版于 2008 年。如果说，第一部专著主要是围绕农民流动行为本身，那么，这一部主要是围绕农民如何获得平等市民身份。这是对于农民流动就业研究的继续深化。农民进城以后，仍是农业户口身份，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基础教育、住房等方面权益严重缺失，公共服务不平等，彰显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离开村庄进入异地，农民强烈地感受到，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关系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些研究报告，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现实感强，政策意见务实。有的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重视，引出开展农民工前瞻性研究的部署。崔传义的大量实地调查，展示体制不平等状态对于社会、农民本身和城乡关系的深刻伤害，呼吁改善制度环境，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对于政策改进贡献很大。

《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调研》出版于 2017 年，汇集 1994—2017 年的有关调研报告。最近若干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议题，不论在研究界，还是政府工作中，都属于重要议程。崔传义先生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早在 1993 年，他作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研究部负责人，参与发起“创业之星”经验交流和表彰活动，以安徽阜阳地区近百个案例为基础，完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调查报告。据本人所知，这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最早的调查报告。报告提出，返乡创业是由农民流动就业派生的必然现象，民工潮的背后将有一个创业潮。进入新世纪后，农民工返乡创业受到高层重视。从 2003 到 2009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若干单位开展系列观察研究，崔传义作为课题组长，组织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百县调查。这些调查报告，一方面梳理农民工通过打工蓄积人力资本、积累创业经验的机制规律，一方面总结地方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经验与问题。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探讨新阶段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特点、含义、作用、趋势、影响因素及政策，对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都富有启发价值。

《中国农民流动就业与现代化》是作者的最新著作，收入 1993—2006 年有关农民流动就业问题的议论性文字。这些文字都是针对特定时间的热点问

题而发,包括:针砭对农民流动就业的误解、限制;赞扬农民流动是走出贫穷、冲击城乡分割的历史创举;探讨农民流动如何改变城乡资源配置,特别是形成扬劳力资源优势之长、避资本技术稀缺之短的产业结构;探讨在国家没有投资的情况下,农民通过流动实现进城就业,如何解决在城镇居住、子女上学、社保等问题;探讨如何改变对农民工不公平的二元体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通观这些研究成果,我冒昧地说,凡研究当今农民流动就业问题者,崔传义的报告是不能不读的。

三

我与崔传义先生认识于1987年。在他之后,我担任王郁昭主任的秘书。那时,我们一起开始农民工研究,商讨切磋,他给予我很多指点。直到现在,我们还一起做研究。30年来,我们不仅是同事,也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是山东同乡,我视他为兄长。

说到对于崔传义先生的印象,我想到了几个“词”。

一曰“勤奋”。相信很多老同事、老朋友会认同我的说法。这种勤勉,既表现在深入农村调查之勤奋,也表现在孜孜不倦于伏案写作之勤奋。积40年研究之功,成专著6部,280万字。相信他今后还会有新作不断问世。

一曰“情怀”。具体说,是一种强烈的社会关怀,再具体说则是对于农民的关怀,也可以引申为一种政治关怀。这种情怀,是他40年钟情于农村研究的精神基础。“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之初,有一些年轻人,从早期农村生活经历中,萌生了社会关切和问题意识。那时中央机关颇有一些激情澎湃、选择以研究农村为志业者。但是,时移世易,曾经的研究社群早已风流云散。崔传义多年追随权倾一地的地方主政者,有很多“另谋高就”机会,但选择从来没有游离过。65岁退休,继续调研写作,勤劳不减当年。对于农民研究,可见其用心之重,用情之深。

一曰“为而不争”。这是一种处世风度,是一种做事风格,也是一种研究生活状态,不事张扬,不加雕饰,散淡古朴。他于农村研究乐此不疲,不仅是职业,而且是爱好,近乎超然物外,臻于“道”景。

本人与崔传义先生交往30年,他已年逾古稀,我也年近花甲。翻看其文



章，感想颇多。借其新作出版，写了以上文字。是为序。

赵树凯

2017年12月

（赵树凯，山东莱西人，法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200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商务印书馆出版《乡村治理与政府制度化》《农民的政治》《农民的新命》《农民的鼎革》。）

前言：改革中的农民流动就业 与大多数人的现代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改革以来近 40 年，我国已从一个改革前 30 年打下一些工业基础但农村人口仍占 80%、尚未解决吃饭问题的贫穷国家，变为城市人口占多数、跻身中高收入国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崛起、社会转型，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分不开。8 亿农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搞活最薄弱的基础产业农业，打开改革的突破口，又为改革解放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自找出路，出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波澜壮阔的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形成近 3 亿农民工推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格局。原来只是少数城市人关上城门发展工业，变为工业化、城镇化与几亿农业劳动力就业转移结合，这应是崛起、变革的一个关键。

无需讳言，农民流动就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是被政策限制的，其发生发展、作用发挥，既以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为背景，又经历了对农民流动就业认识、政策“否定之否定”的变革。变化的转折点在 2001—2003 年。能实现从指责、限制向尊重、支持农民流动转移就业的政策转变，领导与群众合力推进社会发展，这本身就是改革和进步，也留下宝贵的经验和思想、政治财富。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我和同事对农民流动就业基本情况做过持续调查，收入《中国农民流动观察》一书，而所写农民流动就业认识 and 解决问题思路的文章收入本书。1993 至 2003 年的文章，是在农民流动就业受批评、限制时，在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杜润生、王郁昭引导下，和同事一起较独立进行的探索与思考，是对初期农民流动发生发展、政策和体制转变的理解、记忆，如今汇集起来（当初估计错的仍保留，做了注释说明），以助反思过去，观察未来。